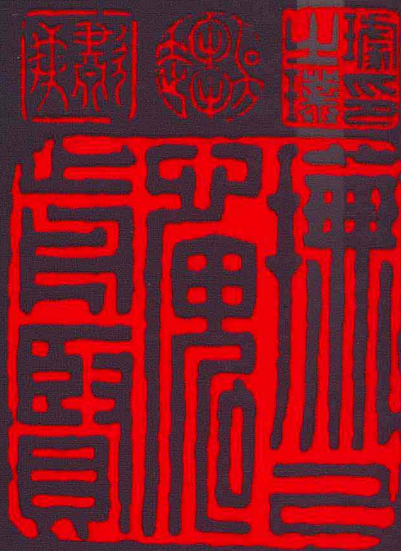


陈道义 周新月 著

吴门篆刻史研究

WUMEN ZHUANKESHI YANJIU



 文物出版社

吴门篆刻史研究

WUMEN ZHUANKESHI YANJIU

陈道义 周新月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编辑：孙霞

责任印制：张道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门篆刻史研究 / 陈道义, 周新月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010 - 3512 - 0

I. ①吴… II. ①陈… ②周… III. ①篆刻—艺术流派—美术史—
研究—中国 IV. ①J292.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0870 号

吴门篆刻史研究

陈道义 周新月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编 100007

http: //www. wenwu. com

E-mail: web@wenwu. com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17. 25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512 - 0 定价: 60. 00 元

“二〇〇八~二〇〇九年度中国书法家协会
(年度) 学术课题” 资助项目

序一

吴门千秋印 文人方寸心

陈道义和周新月合著的《吴门篆刻史研究》，是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吴门篆刻发展历史的专著，书中阐明了吴门篆刻的发展与文人画的关系。

中国文人画的成熟，表现在诗、书、画、印一体上。文人画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体现出中国文人确认和彰显文人身份的成系列的艺术特征。

在中国文化史上，文人作为一个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群体的出现，是和自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因此出现了文人群体。唐代科举的进士考试要考诗赋，在“选人应格”中将楷书遒美作为选士的条件之一。因此唐代文人的诗书结合是很自然的事。北宋朝廷以“士大夫治天下”，形成了地位优越的士大夫阶层。其中苏轼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他提倡“士人画”，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又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开诗画结合之先声。

蒙元统治下的汉族文人，曾因长期废除科举，堕入卑下的地位。也有文人标举士气，以诗、书、画自娱。元代海运兴起，昆山为海道漕运之枢纽，涌现了以运输经商而富甲一方的巨贾，“吾昆山顾阿瑛，无锡倪云林，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艺，风流蒙赏，为东南之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顾阿瑛于玉山草堂常邀文人雅集，规模大者有十二次。参加雅集者多兼有诗、

书、画的才艺，有杨维桢、柯九思、倪瓒、张雨、袁华、王冕等。其中有以刻印著称的朱珪，在玉山雅集的文人酬和的诗、书、画的活动中，又添加了篆印的内容。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苏州文人又遭压制残害，许多士人感到仕途暗淡，退隐市中，以诗、书、画、印抒发逸气。自成化后，贸易渐开，位于江海运河交会的苏州，成为东南第一商业大都会，亦是教育最隆盛之地，明朝的苏州府共出状元7人，进士970人，苏州的生员更不计其数。然而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毕竟是少数，加上明朝朝廷屡有争斗，常有去官归隐者。吴门的故吏、门生、亲朋、好友、艺师错综交织成庞大的关系网，在中晚明时期，苏州文人交往之盛可称空前，以诗、书、画、印会友，或联袂创作；或作诗倡和；或画像题跋；或鉴赏铃记。于是，在明代中期，文人画的诗、书、画、印一体成于吴门。

吴门文人画中的诗、书、画、印，先形成了吴门画派和吴门书派，而以篆刻印章蔚成一派的时间最晚。元明之际，刻章者多为应酬或自娱。明代中晚期，苏州商业繁盛，对艺术品的需求增加，艺术市场趋于成熟，吴门文人书画家以出售书画为生计之一，书画作品上的应用的篆刻印章的种类和样式也都有增加，促使篆刻家更多以石刻印，而且有以刻印为业者。吴门篆刻家中，文氏家族的篆刻家辈出，影响深广，又以文彭声名最著，文彭上承其父文徵明，下启其孙文震孟和诸多弟子，吴门篆刻名家辈出，影响深远，已成派系。

清代中后期，吴门篆刻余脉未断。清末民初，海派艺术风行，刻印之风盛于沪、苏、杭。吴门篆刻大家风涌而起，长期寓居苏州的吴昌硕开一代新风，苏州地区的赵古泥等篆刻家特立一方，吴门篆刻重又复兴。

吴门篆刻以文人画始，又以文人画兴，前后相延七百年。在这期间，吴门篆刻家的刻印，由自娱、赏玩、交往转向艺术市场，并且完成了文人画的诗、书、画、印系列特征的构成。从这意义上讲，吴门篆刻史在中国篆刻史上居有开山和海纳的独特地位。

对吴门艺术的研究，以吴门画派的研究最多，吴门书派次之，关于吴门篆刻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缺少对吴门篆刻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的专门著作，因为要撰写吴门篆刻史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作者要通晓和精通篆刻，其次要

熟悉吴门艺术的发展状况，还要了解苏州地方史，更重要的是高屋建瓴地宏观地认识吴门篆刻史。庆幸的是，在陈道义和周新月的通力合作下，持之以恒地完成了《吴门篆刻史研究》的专著，这与他们有心、有恒、有实践、有功力、有合作精神分不开的。

陈道义钟爱书法篆刻，好学不倦，勤奋钻研。先后经徐无闻、华人德二位导师的传授，在西南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又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获博士学位。有着深厚的书法理论功底，他的篆刻和书法有很高的造诣，多次参加国际和国家级的篆刻艺术展，并获得奖项。现为苏州科技学院美术系教授，任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东吴印社社长。他勤于思索，长期注重理论研究，在苏州科技学院的支持下，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篆刻和书法的论文，并撰写了多部研究篆刻和书法的专著。由于他对吴门篆刻的继承和发扬作出的突出成绩，被认定为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篆刻代表性传承人。

生于苏州水乡的周新月，颖悟博学，浸透着姑苏文人的文化气息。求学时，受到工艺美术的专业教育和训练。他曾在苏州红木雕刻厂、艺石斋等工艺美术单位工作，不仅熟谙雕刻工艺，而且对篆刻艺术有独到而深入的研究。自八十年代以来，孜孜不倦地进行吴门篆刻史的研究，对吴门篆刻的代表作家文彭有深入的研究，被同人称道。他还对吴门篆刻家朱珪、何震、王梧林等人作了专题研究，又总研究成果之成，发表了《吴门篆刻史论》，这为进一步撰写《吴门篆刻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陈道义和周新月的合作，各显其长，相得益彰，对吴门篆刻的研究有了更广和更深入的思考。

专著《吴门篆刻史研究》有着较强的学术性。在吴门篆刻史的历史分期上，没有采取传统的以王朝进行分期，而是根据吴门篆刻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来分期，并且采用了史论相结合的方法。著作中将文人篆刻的出现作为吴门篆刻的起点，以元末明初为吴门篆刻的第一发展阶段，介绍了这时期篆刻代表人物吴叡、朱珪，特别提出玉山草堂及吴中印学群体。以明代中期为第二发展阶段，因为在这时期篆刻艺术已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形成了吴门印派。又将其后的万历年间，也列作吴门篆刻的一个发展阶段，除了著作中列举的印人辈出、石章普及、技法成熟、印学昌盛等原因，苏州艺术市场的兴起是重要的推动力。明末清初和清代中后期是吴门篆刻的延续期和式微期。清末民初的吴门篆刻，为最后的发展时期，被称之为复兴期。在这一章中，详

析了吴昌硕前后寓居苏州三十多年形成“吴派”印风的过程，他培养了许多吴门篆刻人材，续就了吴门篆刻艺术的新篇章。书中通过吴门篆刻在不同历史期的发展状况，完整地揭示了吴门印人随时代变迁而浮沉变化的历程。

《吴门篆刻史研究》还具有翔实的资料性。吴门历史上的印人，人数众多，他们的活动事迹多散见在各种古文献中。书中不仅详尽地搜集整理了各时期吴门印人的传记资料，还记叙了印人的交往活动。而且外延记载了徽籍印人和受“浙派”、“皖派”影响的吴门印人，使人感到有脉有络，脉络分明。

《吴门篆刻史研究》对篆刻风格发展的研究，表现出精准的专业性。这与本书作者精通篆刻艺术有关，能够准确地梳理出吴门篆刻各时期的风格特点。对代表作家的篆刻作品能从艺术角度作具体分析，如将文彭的篆刻作品从风格上分为四类，透露出作者锐利的专业眼光。因此《吴门篆刻史研究》是一部阐释吴门篆刻发展历史的具有学术性、资料性、专业性的专门著作。

观吴门篆刻之印，犹如览苏州园林，小中见大，曲折有情。刻印意远，神闲气定，心无旁骛，虽方寸之地，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本书作者以印人之心铭刻吴门印人之迹，一部《吴门篆刻史研究》，道尽吴门印人甘苦，显扬吴门篆刻峥嵘，期许吴门艺术繁盛。“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张朋川

序二

十年一剑 霜刃待试

——《吴门篆刻史研究》代序

从动手到脱稿，《吴门篆刻史研究》大约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

生平所好，唯有饮酒、读书而已。自小胸无大志，好弄雕虫小技，又因生性疏懒，时习时辍，终无大成。读书之余，因于篆刻的兴趣，不时写些文字。作为本书作者之一的我，生于苏州，长于苏州，故而尤为关心吴门前贤有关印学的事迹。最初，与王伟林兄谈起吴门篆刻的这一课题，伟林兄十分支持，并推荐了陈道义兄作为合作者。道义兄是徐无闻、华人德两先生的高足，学术造诣甚深。又，之前即有往来，于印学颇有投契之处，故而相约共同着手这一课题的研究。

苏州地区（即吴门）篆刻艺术源远流长，迄今约有七百年历史，文人治印的风气世代相沿，经久不衰，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篆刻名家，并且形成了“吴门派”及“娄东派”、“虞山派”等篆刻艺术流派。吴门文人篆刻，是苏州地域文化的优秀遗产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篆刻史中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过去我们对于吴门篆刻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建立在《印人传》等少数有限史料基础上的，基本沿袭明清时人的一些陈旧观念，撰述者又往往不加考证，相互引论，以讹传讹，这显然是与吴门篆刻这份丰富的文化遗产所不相符合的。可喜的是，近三四十年以来，随着印学研究的深入，有关吴门篆刻的课题得到了印学界的重视。苏州篆刻前辈矫毅先生是较早地注意吴门印学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撰写了许多介绍吴门印人的文

章。在归之春、孙洵、韩天衡、黄惇、孙慰祖、萧高洪、孙向群、盛静斋、顾工、刘东芹等先生的有关著述中，也有对吴门篆刻及印人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将苏州地区的篆刻作为地域篆刻史的研究，尚无案例可供借鉴。所以，将吴门篆刻史列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也是极具学术价值的，吴门篆刻的优秀传统，为我们课题的展开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本书最初的课题，曾经拟名为《吴门篆刻史》，后从慎重的角度考虑，这一课题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所以最后定名为《吴门篆刻史研究》。本书的撰写仍是以历史顺序为线索，又因名为“研究”，故而我们力求在史料翔实的基础上，着重于论述的展开。

本书的写作，我与道义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相互商榷讨论，充实完善，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学术认识。除了写作之外，尤值得一提的是，道义兄为这一课题所作的努力，最初在其执教的苏州科技学院申报了课题项目，后来又成功申报了“二〇〇八～二〇〇九年度中国书法家协会（年度）学术课题”，为课题的研究争取到了一些资金，最后又联系文物出版社出版。所以，本书的面世，道义兄是功不可没的。

囿于我们的见识和认知，本书的写作，只能说是建立了一个学术的框架，缺憾是在所难免的，有待进一步地深入和完善。本书的面世作为这一课题的结果，也算是一个小结。写作期间，稽索、爬梳、分析、归纳，个中甘苦亦惟自知。贾浪仙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这把剑虽然打磨的时间是长了一些，自我感觉至少局部的“淬火”似亟待加工，但质量究竟何如？还得有劳读者的评点，在此，真诚地期待诸位师友和同道的批评指教。

是为序。

周新月

2012 暮春于姑苏胥江渔舍

目 录

绪 论	1
一 吴门篆刻艺术发展的历史因素	2
二 吴门文人对于篆刻艺术的贡献	12
三 吴门印派的风格演变及其兴衰	15
四 吴门印人的创作心态和特征	20
第一章 元末明初的吴门篆刻	27
第一节 吴叟与文人篆刻的传入	30
第二节 朱珪及其印学实践	37
第三节 元末编辑的集古印谱	45
第四节 明初文人与篆刻	49
小 结	54
第二章 明代中期的吴门篆刻	56
第一节 吴门书画发展对篆刻的影响	58
第二节 文徵明、唐寅的先导作用	66
第三节 文彭及其篆刻	75
第四节 文彭同时代文人的篆刻	83
小 结	94
第三章 万历年间的吴门篆刻	95
第一节 “三桥派”的延续	97

第二节 徽籍印人与吴门印派	107
第三节 对于印学理论的贡献	116
第四节 印谱的编辑	128
小 结	133
 第四章 明末清初的吴门篆刻	135
第一节 “吴门派”篆刻之余响	137
第二节 林皋与“虞山派”篆刻	147
第三节 印学研究的延续与发展	155
第四节 沈德潜的印缘	161
小 结	166
 第五章 清代中后期的吴门篆刻	168
第一节 吴门篆刻之式微	169
第二节 顾湘及其编著的文化意义	203
第三节 集古印谱与印学研究考证	208
小 结	218
 第六章 清末民初的吴门篆刻	219
第一节 清末民初吴门篆刻的复兴	220
第二节 吴昌硕与苏州	236
第三节 赵古泥及其篆刻艺术成就	246
小 结	256
 主要参考书目	257
 后 记	260

绪 论

吴门地区的篆刻艺术源远流长，大致可以追溯至元代晚期，至今已有约七百年的历史。其间，文人治印的风气世代相沿，经久不衰，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篆刻名家，并且形成了“吴门派”及“娄东派”、“虞山派”等篆刻艺术流派。本书即是以这一地区的文人篆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吴门的文人篆刻，是苏州地域文化的优秀遗产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篆刻发展史中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

吴门，是苏州的别称。苏州，在元代称平江路，明、清两代称苏州府，曾先后管辖吴、长洲、元和、吴江、盛泽、昆山、新阳、常熟、昭文、太仓、镇洋、嘉定、宝山、崇明等县。1912年后，长洲、元和并入吴县，盛泽、新阳、昭文、镇洋分别并入吴江、昆山、常熟、太仓。1949年后，嘉定、宝山、崇明三县划归上海。1962年，自常熟、江阴析出沙洲县（即今张家港市）。2000年，吴县并入苏州市区。所以，本书中的“吴门”，泛指现今苏州市区以及苏州市所辖吴江、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五个县级市的范围。

历史上，吴门篆刻向为学者所关注。如明末清初周亮工的《印人传》，清代汪启淑的《续印人传》（又名《飞鸿堂印人传》）、冯承辉的《历朝印识》《国朝印识》，近代叶铭《再续印人传》等，载录有许多吴门印人的传记及史料，并在各书所录人物中均占有较大比重。

除此之外，在许多地方志、笔记、印谱序跋及诗文集集中均有较多相关的史料。可惜的是，过去我们对于吴门篆刻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建立在《印人传》等少数有限史料基础上的，基本沿袭明清时人的一些陈旧观念，撰述者又往往不加考证，相互引论，以讹传讹，这显然是与吴门篆刻这份丰富的文化遗产所不相符合的。可喜的是，近三四十年以来，随着印学研究的深入，有

表1 《印人传》等书记载吴门印人一览表

作者及书名	全书收录人数	苏州籍人数	曾客寓苏州人数
周亮工《印人传》	65	12	3
汪启淑《续印人传》	128	16	4
冯承辉《历朝印识》(含补遗)	220	29	6
冯承辉《国朝印识》	326	47	10
叶铭《再续印人传》	747	121	24

关吴门篆刻的课题得到了印学界的重视。苏州篆刻界前辈矫毅先生是较早地注意到了对吴门印学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撰写了许多介绍吴门印人的文章。在韩天衡、萧高洪、黄惇、孙慰祖、孙洵、归之春、盛静斋、顾工、刘东芹等先生的有关著述中,也有对吴门篆刻及印人较为深入的研究。

本书的写作,可以说是我们近年来对吴门篆刻研究的一个小结,同时也借鉴了他人的学术成果,将其作为地域篆刻史的一次尝试。本书名为《吴门篆刻史研究》,虽然是以历史顺序为线索贯穿写作的,但我们力求在史料翔实的基础上,着重于论述的展开。囿于我们的见识和认知,本书的写作,只能说是建立了一个学术的框架,缺憾在所难免,有待进一步地深入和完善。在此,我们真诚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也期望有志于此的同道的参与,与我们一起为还原吴门篆刻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努力。

一 吴门篆刻艺术发展的历史因素

吴门文人篆刻之所以能够在元、明、清时期取得较快地发展,并且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是与苏州地区的地理、经济及其由此所孕育的文化艺术传统分不开的,并与以上各个时期的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都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苏州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商业经济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余地,使这一地区的总体经济更为繁荣富庶。富庶的经济促进了苏州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无疑是吴门

篆刻艺术发生、发展的有利条件。

从地理环境看，苏州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北枕长江，南抱太湖，京杭大运河贯穿其境，川泽密布，河道纵横，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土地肥沃，自然物产富饶，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成为了“吴文化”的摇篮。在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草鞋山遗址和昆山绰墩山遗址中，都曾发现过距今约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稻田遗迹，是迄今所发现中国最早具有灌排系统的古稻田，同时还出土了人工栽培的水稻植株残骸和碳化谷粒。自春秋吴国时吴王寿梦迁都于此，吴王阖闾时，由伍员（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督造阖闾大城，苏州城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古谚谓“苏湖熟、天下足”，吴地由此成为了历代朝廷财赋的重要来源。明人王鏊曾说：“今天下财赋多仰东南，东南财赋多出吴郡。”^①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明代洪武、弘治和万历年间朝廷向苏州府征收麦米的数量：

表2 明洪武、弘治、万历苏州府征收麦米数量比重表

	麦（石）			米（石）		
	洪武 26 年	弘治 15 年	万历 6 年	洪武 26 年	弘治 15 年	万历 6 年
全国	4712900	4625594	4605243	24729450	22166666	22033171
苏州府	63500	53664	53665	2746990	2038323	2038895
百分比	1.36%	1.16%	1.17%	11.11%	9.20%	9.25%

从上表中^②，我们可以看出苏州在当时全国财赋中所占的份量。由于苏州地区的粮食生产是种植水稻为主的，所以，秋粮（即大米）的比例尤其重要，大约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洪武二十六年（1393）则占 11.11%。又如，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朝廷向苏州征收的大米为 883318 石，竟占全国 7163615 石的 12.33%。

①（明）王鏊：《吴郡治水之碑》，（清）黄宗羲《明文海》卷六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表2、表3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一书中的相关表格编制。

富饶的物产，为苏州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使之成为东南地区大都会之一。自秦至清，苏州城历为会稽郡、吴国、吴郡、吴州、苏州、中吴军、平江军、平江府、平江路、苏州府、江南右布政司、苏州（江苏）布政司的治所。隋唐之际，扬州曾是东南地区第一大都会，至唐中叶时，苏州人口数量已超越扬州。我们可将唐初及中期扬州、苏州和当时东南另一个大都会杭州的人口作一比较：

表3 唐初、中期扬州、苏州、杭州人口对比表

	户数			人口数		
	扬州	苏州	杭州	扬州	苏州	杭州
贞观 13 年	23199	11859	30571	94347	54471	153720
天宝 1 年	77105	76421	86258	467857	632650	585963

大历十三年（778）苏州擢升为雄州。宝历元年（822）诗人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他曾用“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的诗句来描写当时苏州的繁华。

在农业（包括渔业）基础上形成的繁荣，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古代苏州商业的发达，首先是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富庶的民生，势必影响市民消费需求的提升，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反之，商业的发达又进一步地促进了苏州经济的繁荣。苏州商业的发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苏州的地理位置在古代交通中的枢纽作用。水路，是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交通运输通道。苏州地处长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段，又拥有太湖水系发达的干支航线，交通可谓四通八达。本地丰富的物产，外埠经停的商货，在此贸易或中转，使其成为了东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早在《隋书》中，即已论及当时吴郡及宣城、毗陵、会稽、余杭、东阳等东南诸郡的特产和商业：“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①至唐、宋时，苏州的商业的已较为发达。元代的昆山“为市易之区，百货全集”^②，昆山所

①（唐）魏徵等《隋书·志》第二十六，“地理下”，中华书局 1973 年，第 887 页。

②（元）郑东《林屋山图记》，（明）赵琦美《铁网珊瑚》卷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辖刘家港（今太仓浏河镇）是当时重要的出海码头，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即是由此出发的，当时的刘家港“市民漕户云集，雾滃烟火数里，久而外夷珍货棋置，户满万室”^①。元代昆山籍的顾阿瑛和长洲籍的陆德原、沈万三等都是以业贾致富、名闻遐迩的巨室，其中顾、陆俩人雅好艺文。尤其是顾阿瑛，曾经从事过“走番”（即海外贸易），并与当时的印学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明代中期以后，苏州及江南一带的经济取得了高度地发展，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并出现了行业分工细化和劳资雇佣关系等被近代经济学家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在这一时期中，苏州地区的商品贸易显得尤为活跃。明嘉靖前后，苏州的商业活动臻于鼎盛，而以阊门内外（包括山塘街、枫桥等处）一带尤称繁荣。明人郑若曾曾描写道：

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过者，烂然夺目……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苏州财货莫盛于阊门。^②

清康、乾年间，大学士孙嘉淦途经阊门时，感叹道：“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③自明代中期至清康、乾年间，苏州地区的书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也是“吴门派”篆刻形成和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与同时经济的富庶、商业的繁盛大约不仅是时间上符合，其间的关联，显然是吴门篆刻研究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其二，苏州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富裕的生活、良好的家庭熏陶和发达的教育，形成了崇文好学的民风，使苏州的文化艺术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自古以来所有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无疑是篆刻艺术在此生长发展的土壤。

苏州文艺的兴起，显然是建立在经济富庶的基础之上的。雄厚的财力，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官宦、大族、士人、商贾及其他较为富裕家庭的子弟都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还有一些官办、民办（个人资助或集资）的

①（明）桑悦：《新建太仓州碑记略》，（明）钱穀《吴都文粹续集》卷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明）郑若曾：《枫桥险要说》，（清）施谦《吴县志》卷四十“兵防”，清乾隆十年（1745）刻本。

③（清）孙嘉淦：《南游记》，文艺小丛书社1933年3月再版。